

## ● 历史回眸

## 叩击中国之门(下)\*

[西班牙]卡梅洛·利松·托洛萨那

## 二

这些不成功的旅行产生了一流的民族志文学,它和其他一些葡萄牙人的叙述<sup>②</sup>一起把中国介绍到欧洲来。列兵米格尔·德·洛尔卡(Miguel de Loarca)的《中华帝国实录》和他的旅伴马丁·德·拉达(Martin de Rade)神甫的《记大明的中国事宜》在前文已提及的门多萨(Gonzale de Mendoza)所著的《大中华史》中曾反复被引用,而后者是一本在十六年间(1585—1600)出到第三十八版的畅销书,西欧的分子和有文化的人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该书。天朝帝国成为了时尚。而在另一个地区,中国及所有中国事物的所带来的冲击则影响和促成了传教士们的一种再思考和新态度,他们当时正经历着一场意识形态危机。<sup>③</sup>

耶稣会士何塞·德·阿科斯塔(Jose de Acosta)(1540—1600)在1572年到达秘鲁,值得强调的是,关于对美洲的征服,他有着神学上的准备和司法上的定位,这是他在阿尔卡拉大学时在多明各·德·索托(Domingo de Soto)和梅尔乔·卡诺(Melcher Cano)的指导下形成的,此二人是维托里亚(Vitoria)的弟子。阿科斯塔熟练了维托里亚(Vitoria)、曼西(Mancie)、科罗巴(A. de Cordoba)、迭戈·德·科瓦鲁维亚斯(Diego De Covarrubias)等人关于美洲的著作

\* 《跨文化对话》第三辑曾登载该文的第一部分,这里发表的是该文的第二、三部分,全文完。——编者

和评论,而且在大学期间也读了一些从印度群岛到达西班牙的历史记载和叙述。甚至在踏上殖民地之前,他对征服和处置印第安人所持的伦理道德立场就是萨拉曼卡学派观点的翻版了。他在秘鲁四处旅行了三年多,探访了偏远教区和印第安人的保留地,直接经历了对当地土著的平定战争,并努力想要取得有关土著居民道德和政治状况的第一手材料,所有这一切都证实、支持甚至是加强了他的道德立场和心态。他在秘鲁登陆,这是第三个决定性因素,不仅决定了他的意识形态也决定了他的行动,就在那时,政治危机(战争公正吗?印第安人应该得到补偿吗?)和宗教危机(福音化的手段失败了吗?)正痛苦地动摇着西班牙人的良心、喉舌和他们的笔。阿科斯塔迅速做出了反应;他在1576年召集了第一次修士们的全体大会,在1582年又召集了第二次理事会;他学习了盖丘亚族语并且把教义问答译为印第安语。他并不满足于此,而是继续进行另一种活动。他做了一些调查,参考了一些报道和文献,听取了那些从遥远地区来的传教士们关于他者生产方式和习惯的情况。他仔细思考了以上一切,写下了《对拯救印第安人的关注》(1576—1577)并且开始写作《印度群岛的自然和道德史》。他在两本书中都显示了他的文化人类学详尽知识及其兴趣,而这些都得益于远东的传教士们;书中有一些部分专门谈到了中国;其帝国之辉煌,其行政组织结构及其特有的文化特征都给阿科斯塔神甫这样具有开放心态及文艺复兴思想的传教士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养料。除此之外,身处秘鲁的他把中国视为一块合适的土地,在那里他可以把自已传教学论文中的意见付诸实践。

这个耶稣会士被中国人所吸引。他带着强烈的兴趣阅读着教团的神甫们<sup>④</sup>发来的信件并把它们互相比较,他利用一切机会和借口以从在那里工作过的传教士们身上获取第一手的信息,他甚至从他在墨西哥遇到的一个中国人那里寻求有关知识,那里由于有中国的船只停泊所以经常会有中国的消息。当谈到“中国人所用的文字”<sup>⑤</sup>时,他讲述了以下这个实验,它可以证明他的求知欲:“很难理解他们如何能用自已的语言来写下那些外国人的名